

苏联1928年粮食危机问题上党内分歧的实质

——正确评价布哈林的一个问题

陈 维 廉

在1927—1928年苏联出现了一次粮食收购危机,由于对这次危机的不同认识,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斯大林与布哈林对于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和处理危机的方针政策,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导致他们的决裂。今天我们探讨由于这次粮食收购危机所引起的党内意见分歧的实质,对于正确地评价布哈林,正确地认识苏联党内二十年代这次重大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坚持开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在1928年粮食危机所引起的党内分歧问题上,对于布哈林的评价,前一段时间提出了许多看法。有的同志由于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时,内容有所夸大,把对富农的不同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取消对富农的斗争;由于斯大林在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上有错误,在农业集体化速度、方法上和消灭富农政策上,有不妥善的地方,就根本否定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评,并且认为布哈林在这次党内分歧中都是正确的。这种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看法,是脱离了历史的实际的,也是不正确的。下面我们“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加以分析。

苏联的1928年粮食危机是在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的。这时工农业已经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社会主义成份在工商业中日益增长,私人资本主义成份比重不断下降。在农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存在着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壮大起来的富农经济,而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经济还很弱小(只占粮食总产量的1.7%和商品粮的6%)。所以农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工业的发展,结果国家收购的粮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1927年底只收购了3亿普特,这个数字比1926年底收购的42800万普特少12800万普特。“这个缺额也就是粮食收购危机在数字上的大略表现”^②

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就意味着城市居民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发生危机,也意味着粮价上涨和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和出口贸易的减少,从而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减慢。从理论上来说,这也是对六年多来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粮食收购政策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它提出了对富农经济究竟应该如何限制和改造,对小农经济究竟如何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私商、富农经济和大量小农经济条件下,商品自由贸易的范围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面临粮食收购危机,在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问题上,苏联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是同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同粮价与其他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比例极不相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造成生产力从谷物中(相对地)转移了。也就是说不正确的价格政策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③

斯大林的看法同布哈林相反,他认为价格政策不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特殊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粮食采办工作遭到了富农的激烈反抗所造成的。一种是长远的基本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导致商品粮日益减少所造成的。^④

这两种意见究竟那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这只有深入具体地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布哈林在论证价格政策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时,提出了两条论据。

其一是粮食总产量的下降,1926—1927年度粮食产量为37亿7900万战前卢布,1927—1928年度为37亿零800万战前卢布。1926—1927年度粮食产量比上一年提高3.8%,而1927—1928年度却下降1.9%。(实际上降低得更多)^⑤

确实,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和粮食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谷物产量一般是受粮食价格调节的。如果价格过低,农民就会改种谷为种棉,这样谷物产量的下降就会与播种面积的减少同时出现。但实际上苏联在1925—1927年粮食播种面积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加的。1925年为8730万公顷,1926年为9370万公顷,1927年为9470万公顷。而粮食产量1925年为72460万公担,1926年增至76830万公担,1927年为72300万公担。^⑥1927年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播种面积的减少,而是单位面积产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小农经济落后,部分地区受灾造成减产。所以单凭粮食产量稍有下降,还不能得出价格政策是形成粮食收购危机主要原因的结论。

其二是北高加索的单位粮食产量与粮食收购价格逐年下降,因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北高加索1925—1926年一俄亩粮食产量为69.9普特,每普特规定的收购价格为1.15卢布。1926—1927年一俄亩粮食产量为37.9普特,每普特规定价格为1.02卢布。这说明粮价在一些地区规定的不合理确实是粮食收购发生困难的因素之一。但布哈林在举出北高加索的例子时,特别声明,这个例子不典型,不够精确,“这是一种例外情况。人们不能由此判定总的情况”^⑦这样,布哈林自己就不能肯定价格政策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

对于粮食价格的不合理状况,苏联自1923至1928年曾经多次进行过调整。一方面逐步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适当地提高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价格,以便逐步缩小“剪刀差”。从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10月1日,国营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降低了25.3%。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如以1913年的价格为1,则此期间从0.888调整为1.36。“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⑧1927年6月又一次降低工业品零售价格10%。^⑨在粮食收购危机发生以后,1928年7月又根据不同地区和种类,提高了粮价。^⑩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缩小剪刀差和提高粮价的措施,却仍然没有解决粮食收购危机。

为什么调整价格政策仍然不能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呢?根本原因就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私人资本和富农经济的条件下,在粮食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仅仅靠调整价格政策,而不依靠国家计划经济的调节,不同富农的投机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是不可能解决粮食危机的。

那么,斯大林谈到富农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粮食收购工作的破坏是否符合实际呢?从当时苏联的情况看,富农势力确实在增长。据统计,十月革命前富农经济的比重占农民总数的15%,在国内战争时期曾降至4—5%,到1924—25年又增至6.9%。^⑪1926年雇工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7.6%,^⑫雇佣的工人从1920年的81.62万人增至1926年的227.53万人,租用的土地达到700万俄亩。^⑬1928年富农达100多万户。^⑭尽管苏维埃政权对富农采取了高额累进税的限制政策,但富农仍然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限制的斗争。

这样,粮食价格问题就成为苏维埃政权与富农之间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焦点。富农往往

以高于国家规定价格一至两倍出售粮食，同时利用季节差价，在秋季低价收购粮食，在春季以高价出售，从而把高额累进税的负担转嫁给贫下中农，并大发横财。对于这种粮食投机，苏联采取了逐步缩小季节差价的政策。以小麦为例，1924—1925年春季对秋季的差价为191%，到1925—1926年缩小到105%，1926—1927年完全取消了差价。^⑤但是，富农拒绝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而把粮食以高价卖给私商。虽然季节差价消失了，又出现了国家规定价格与私商收购价格这两种价格，私商和富农收购粮食的比重从1926—1927年的14%上升到1927—1928年的23%，富农以高于国家规定价格一倍卖给私商，从中得到4亿卢布的巨额利润。^⑥粮价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1928年私营贸易价格总指数提高25.8%，国营贸易提高3.8%。^⑦这就造成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加重了贫下中农的粮食困难，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这就清楚地表明：对富农这种破坏粮食收购政策的行径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打击，而任其滋长，就会使粮食收购危机更加严重，并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主要由于不合理的价格政策所造成的，而富农对粮食进行投机却正是造成暂时性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

苏共党内对粮食收购问题上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解决危机采取什么方针政策。

布哈林提出：既然价格政策不合理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那就首先要调整价格政策，以便使谷物生产在个体经济的增长基础上得到解决。同时，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逐步地缓慢地引导农民组织销售、采购、信贷合作社，进而组织生产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则提出：从当前来看，首先对富农采取法律措施，强制富农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严惩富农的粮食投机，即没收其投机的全部粮食，把没收的25%粮食贷给贫下中农作种子或食用。要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根本改变小农的状况，实现全盘集体化。

这两种处理粮食收购危机的方针是根本不同的，概括来说，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不要对富农采取法律措施。从当时情况看，据统计富农手中直接掌握的商品粮占商品粮总数的20%（即12600万普特）^⑧如果加上富农与私商一起套购的粮食，则大大超过了富农所直接拥有的商品粮数。这个数字正相当于国家没有达到预期收购的商品粮的差额。

对富农经济要不要进行斗争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布哈林的著作和他所主张的政策，可以看出他并不否认对富农进行某种形式的斗争。他提出为了反对农村私商，要开办优秀的合作社店铺。为了反对高利贷，必须建立低息的信贷合作社。为了反对富农的恶劣雇佣条件，国家应制订有利于雇工的劳工立法等等。^⑨所以，那种认为布哈林要根本取消对富农的斗争的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把对富农的斗争一般限制在上述形式之内，并且实际上放弃了行政和法律措施。这样，在遇到了富农在粮食领域疯狂的投机时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这里暴露了布哈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刻的矛盾。

布哈林明显地低估了富农的力量及其在破坏国家粮食收购中的作用，错误地以为单靠调整价格就可以解决粮食危机。而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在客观上助长富农力量的增长，并进而加速农村的两极分化进程。

其次是要不要实行粮食贸易的自由。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

集制，同时在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因而找到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的结合点，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流通，迅速地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在1924年，又把粮食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进一步扩大了私人贸易的范围，使通过商业途径采购农产品成为国家取得农产品的唯一形式。粮食贸易由市场调节，不久就发现，粮食自由贸易有失去控制的危险。这主要是私商与富农勾结起来破坏粮食价格的稳定，并对粮食进行投机。结果国家不得不规定粮食价格并缩小季节差价，以限制私商与富农。历史经验表明：在过渡时期存在着小农经济条件下，在存在着私商和富农的情况下，实行粮食贸易自由是十分危险的。私商和富农会利用粮食贸易自由破坏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小农经济会进一步分化，而国家将丧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和保护作用，结果就会造成粮食收购危机。

布哈林只看到了价格调节作用，而忽视了国家计划的调节作用。他把粮食贸易自由当作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粮食贸易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基础之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是通过什么途径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如何判断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途径呢？这里首先应该考察苏联的农村阶级状况，看看哪条道路更适合苏联农村的实际。

据苏联1927年对60万户农民的典型调查统计，雇农约占10%，贫农约占24%，下中农约占18%。这三类合计占总农户52%。中农约占30%，上中农约占14%，富农约占4%。（富农数不够准确）^①一般说来，雇农、贫农和下中农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是很少的，他们缺乏生产资料，迫切要求在生产上组织起来，克服缺乏农具和牲畜的困难，依靠集体的力量把生产搞好，从而彻底摆脱贫困分散落后的状况。因此，集体农庄是他们的康庄大道。中农约占全体农户的44%，他们拥有一些剩余产品，一般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生产上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在生产上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在销售产品和采购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又受到富农的排斥和竞争。除极少数富裕中农倾向富农以外，总的说，中农有组织采购、销售、信贷合作社的要求，但没有立即组织集体生产的要求。富农，他们拥有相当多的生产资料，大量的农具和牲畜，较肥沃的土地。他们往往采用雇工，或把农具和牲畜租给贫苦农户，或向贫苦农民租种土地等方式进行剥削。集体农庄的发展破坏了他们剥削的美梦，所以他们极力反对组织集体农庄。但是，为了同其他农户进行竞争，他们也会组织一些采购、销售、信贷“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按其本质来说不过是为了维持富农剥削的一种联合，它既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这里很明显，斯大林提出的组织集体农庄的道路，受到多数贫农下中农的支持。布哈林提出的组织采购、销售、信贷合作社的道路，也受到相当一部分中农的支持。但布哈林却认为集体农庄“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②这也就忽视了占半数以上的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同时，布哈林还抹煞了富农组织的“合作社”与广大贫农和中农组织的合作社的本质区别。这样布哈林在理论和实践上又一次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即一方面在理论上他认为贫农是农村的支柱，^③而在实践上又反对贫农和下中农所拥护的集体农庄。他在理论上强调主要依靠农民的供销、信贷合作社，在实践上却又把富农组织的“合作社”看作同农民组织的合作社没有什么两样。结果他使自己的政策建立在极不稳固的阶级基础之上，而这也正是布哈林的农村政策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在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处理粮食危机的主要措施，粮食贸易的价格政策，以及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途径等一系列问题上，布哈林都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和主张。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富农的政策上，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富农，仍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②③}即使在发生了富农破坏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之后，仍然是如此。所以，他始终过高估计了富农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而低估了富农在国民经济中的破坏作用，并进而否认富农破坏是暂时性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反对对富农采取法律措施，主张继续对富农在粮食价格政策上让步，直至主张富农合作社可以和平长入国家经济机关体系等等。^{②④}

但是，从这场争论全面情况来看，布哈林的这些错误仍然属于政策和策略的错误。由于1927—1928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所引起的联共（布）党内斯大林同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实质上是斯大林的正确政策反对布哈林的错误政策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当时是必要的。否认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夸大这场斗争也是不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布哈林的主张没有任何合理的因素。如他提出要注意调整粮食价格问题，尽管在当时价格政策不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因素，但毕竟价格政策是影响粮食收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富农被消灭以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起来了。而斯大林恰恰在这以后又忽视了粮食收购的价格政策，以致严重地影响了苏联后来的粮食生产。又如布哈林关于坚持在自愿基础上逐步组织供销和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尽管仅仅组织供销、信贷合作社远不能满足贫农下中农的要求，但在以发展集体农庄为主的同时，并不排斥逐步组织供销、信贷和生产合作社，以便更稳步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后来的苏联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恰恰是忽视了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等等。

今天，我们在吸取苏联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和联共（布）党内分歧的历史经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的重要性，任何忽视计划经济的错误思想，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但也要注意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否则也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而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更要充分认识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必要性，否则，我们也会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还必须坚持开展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②④⑩⑮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53—158、182、74页。

③⑤⑦ 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⑥⑩⑪⑲ 《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69—270、270、271、249页。

⑧⑬⑱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80、463—464、51页。

⑨⑫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第410、276页。

⑪ 《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下册，第491、511页。

⑭ 《苏联简史》第2卷，第328页。

⑮⑲ 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⑲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合作制问题的发言》。

⑳ 布哈林《关于联共（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㉑ 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